

欧阳修诗编年笺注（第二册）

序言

歐陽修（一〇〇七—一〇七二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年更號六一居士。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永豐人。北宋中期傑出的文學家、史學家與政治家，著名的古文「唐宋八大家」之一。

歐陽修四歲喪父，少年多罹憂患，母親鄭氏晝荻教子，育孤成才。宋仁宗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進士及第，次年任西京（今河南洛陽）留守推官。在洛陽留守幕府中，歐陽修與梅堯臣、尹洙等結為至交，相互切磋詩文，為日後的詩文革新埋下種子。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，召試學士院，授館閣校勘，參編《崇文總目》。景祐三年，范仲淹因讎切時弊，觸迂權相呂夷簡，遭受貶謫，歐陽修為之辯護，也被貶為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縣令，後移知乾德（今湖北老河口），繼而權武成軍（今河南滑縣）節度判官。康定元年（一〇四〇），復任館閣校勘。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，仁宗迫於內憂外患，毅然起用范仲淹、韓

琦、杜衍等，銳意革新朝政。歐陽修被召爲諫官，又授知制誥，積極參與「慶曆新政」，先後提出革新吏治、改革貢舉、克服「三冗」等一系列新政主張。次年出使河東，計度廢麟州及盜鑄鐵錢並鑿課虧額利害，繼而以龍圖閣直學士出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，悉力督行新政。慶曆五年，新政失敗，歐陽修受「張甥案」誣陷，被貶知滁州（今屬安徽）。隨即十年輾轉，先後徙知揚州（今屬江蘇）、穎州（今安徽阜陽）、應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，繼而丁母憂回穎州守喪。直到至和元年（一〇五四）重返汴京，歷經一番折騰，纔留在京師主修《新唐書》，不久陞爲翰林學士。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正月，權知禮部貢舉，擇錄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等優秀人才，借用行政力量，痛革時文之弊，抑黜「太學體」怪誕文風，由此奠定平易流暢的宋文風格。嘉祐五年，拜樞密副使，次年參知政事，與韓琦、富弼等共襄朝政，成就「嘉祐之治」。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，以「濮議」之爭，歐陽修陷「長媳案」，再次蒙受誣謗，從此再也無心居朝執政，最終自請出知亳州（今屬安徽）。神宗熙寧元年（一〇六八），改知青州（今屬山東），熙寧三年四月，除檢校太保、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，堅辭不受。春夏間對王安石「青苗法」持異議，並擅自停發青州境內秋料青苗錢，受到朝廷詰責。秋七月自請改知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，上任後累章告老。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、太子少師的榮銜致仕，退居穎州西湖。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閏七月二

十三日，病逝於西湖私第，享年六十六歲，謚文忠。有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新五代史》及《詩本義》等著述傳世。

歐陽修是宋代學者型政治家的傑出代表，也是中國封建傳統文人立身行事的光輝典範。他承繼中唐韓愈的道統文統學說，肯定並標舉胡瑗、孫復、石介的道文觀，又將其融入世俗化的軌道，實開宋明理學之先河。他一生恪守儒家「仁政」圭臬，進則以道自任，勇於兼濟天下；退而守窮自娛，甘於獨善其身。其生平前期積極參與朝政鼎新，後期堅持穩健改革。縱觀其一生行跡，治國理政，基於寬簡愛民；立言獻策，循依人情物理；為人處世，標舉行義節操。他不滿宋初以來的因循世俗與卑弱士風，竭力倡導並厲行「君子」意識，講究儒教「名節」，以其「果敢之氣，剛正之節」（王安石《祭歐陽文忠公文》）矯正社會陋習，化育士林新風。誠如蘇軾《居士集叙》所說：「宋興七十餘年……而斯文終有愧于古。士亦因陋守舊，論卑而氣弱。自歐陽子出，天下爭自濯磨，以通經學古為高，以救時行道為賢，以犯顏納說為忠。長育成就，至嘉祐末，號稱多士，歐陽子之功為多。」《宋史·忠義傳序》更是充分肯定歐陽修對有宋一代士大夫忠義之氣的培育造就之功，云：「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，變化殆盡。……真、仁之世，田錫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唐介諸賢，以直言讜論倡於朝，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，廉恥相尚，盡去

五季之陋矣。故靖康之變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臨難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節相望，斑斑可書，匡直輔翼之功，蓋非一日之積也。」歐陽修一生行跡，對於淨化宋初污濁的社會風氣，扭轉論卑氣弱的士林積習，培育宋代文人的忠義正氣，具有積極促進作用。

重創造是宋朝時代精神之一，歐陽修正是這一時代精神的首倡風氣者。他一生的政治、學術與文化活動，都站在時代最前列，引領社會新潮流。他信奉《周易》「變通」之學，充滿改革創新精神。其政治改革理想雖然未獲成功，卻堅持將改革創新精神貫徹於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，並取得豐碩成果。在經學研究上，他大膽突破漢唐章句訓詁之學，開啟宋學講義理、求本旨之先聲。他的《易童子問》、《詩本義》等著述，倡導疑經辨偽風氣，緣人情，尚簡要，自出議論，探求經典本義，使經學研究擺脫名物訓詁軌道，轉入講求義理的方向，對理學形成具有草創之功。在史學著述上，他主持編纂《新唐書》，獨力撰寫《新五代史》，通過史著褒貶忠奸，整飭道德，標舉名節，豐富並發展我國正史編纂體例。此外，其《集古錄跋尾》是我國古代金石學開山之作，參與編纂的《崇文總目》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國家圖書總書目，對古代目錄學的發展影響深遠；獨立編撰的《歐陽氏譜圖》奠定明清兩代私家族譜基本範式，對我國譜牒學的發展貢獻卓著。

歐陽修為創立並繁榮宋型文化，作出過全方位開創性的貢獻，其中以文學創作成就

最著、影響最烈。他倡導並領導北宋詩文革新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，繼承並發展唐代古文運動與新樂府運動的成果，奪取了決定性勝利。在文學理論上，他提倡「文與道俱」、「窮而後工」，把「道」與世間「百事」聯繫起來，以文學反映社會現實，守正創新而不廢傳承。在創作實踐中，他「文備衆體」、「各極其工」，為詩文革新提供大量典範之作。其作品既追求崇高、美善刺惡，重振「發憤怨刺」文學，又倡導娛樂，詼嘲笑謔，不遺俚俗，且通體為文，融貫駢散，將前哲先賢的文化批判精神演化為文學的「議論」風氣，導引詩文精神氣質的學術底蘊。仁宗天聖至嘉祐年間，以歐陽修為中心的各種文酒詩會，引領時代酬唱之風，探索文學創作新貌。此外，他利用其優越的政治地位，獎掖後學，培育新秀，痛抑怪僻之學，扶持平易文風，保證詩文革新取得全面勝利。

作為一代文壇宗師，歐陽修為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學遺產。就其傳世詩歌而言，據《居士集》、《居士外集》、《內制集》、《近體樂府》中的有關篇目統計，共計九百三十七首，加上《全宋詩》、《全宋詩訂補》及本書的輯軼，不含殘句與存目，總共九百四十四首。在主盟北宋中期文壇的過程中，歐陽修團結文學俊彥，倡導詩歌革新，創立歐梅詩派，力矯「西崑」，痛抑「太學」，探索時代新調，使宋詩風貌迥異於唐詩，最終繼唐詩而再盛。南宋劉克莊《江西詩派序》指出：「國初詩人如潘閬、魏野，規規晚唐格調，寸步

不敢走作。楊、劉則又專爲崑體，故優人有擷扯義山之誚。蘇、梅二子，稍變以平淡豪俊，而和之者尚寡。至六一、坡公，巍然爲大家數，學者宗焉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也高度肯定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中的領袖地位與傑出貢獻，說：「宋初詩文，尚沿唐末五代之習，柳開、穆修欲變文體，王禹偁欲變詩體，皆力有未逮。歐陽修崛起爲雄，力復古格，其時曾鞏、三蘇、陳師道、黃庭堅等，皆尚未顯，其佐修以變文體者，尹洙；佐修以變詩體者，則堯臣也。」

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歷程，大體與其政治活動相對應，可以劃分爲四個時期：第一個時期，自天聖五年（一〇二七）科舉應試至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貶官夷陵前，這是歐陽修詩歌創作的發軔期。歐陽修十七歲開始參加科考，三試而得第，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二十四歲獲登科，次年春天赴洛陽擔任西京留守推官。今存最早的歐詩，就是京師應試時的作品。詩人應考期間，結識不少文人學士，早期詩歌中，有《送劉半千平陽簿》、《送張學士知郢州》、《送趙山人歸舊山》、《寄張至秘校》等，內容多爲京師之戀及親友之思，抒寫科第見聞感想及良朋好友的離情別緒。天聖明道間是歐詩創作的起步，詩歌學李商隱，學韋應物，學韓愈，學宋初承繼唐音探索宋調的晚唐體、白體與西崑體。規模唐詩，師法多門，是早期歐詩的基本特徵。初入仕途的伊洛三年，在喜文愛才的錢惟演幕

下，詩人與梅堯臣、尹洙等結爲至交，成爲以錢惟演、謝絳爲首領的西京洛陽文人集團的骨幹，以文會友，飲酒賦詩，成爲這一時期生活的重要內容。「七友」、「八老」等文學團體的亭園宴飲，群體性競技性的同題詩歌酬唱，成爲宋詩草創階段一種重要的探索形式。《嵩山十二首》、《游龍門分題十二首》、《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，餞梅聖俞分韻得「亭皋木葉下」五首》等詩作，不斷拓展詩歌題材，深入切磋詩歌技藝，直接導引後來各種文壇群英的文酒詩會，促進宋詩基本特色的形成。「予生本是少年氣，磋磨牙角爭雄豪」（《綠竹堂獨飲》），道出少年歐陽修與詩友酒侶之間的相互激勵與切磋競爭。「余本漫浪者，茲亦漫爲官」，「賴有洛中俊，日許相躋攀」，「平時罷軍檄，文酒聊相歡」（《七交七首·自叙》），展示詩人早期豪爽愜意的生活情態，以及樂觀奮進的精神風貌。三年西京幕府生活，詩人已經擺脫科舉求仕的壓力，廣交文朋詩侶，徧游伊洛山水名勝。《雨後獨行洛北》、《伊川獨游》、《秋郊曉行》等記游詩篇，開始有意識地規避華豔雕琢的西崑體，追求平易清淡，多用三韻五古，注重記敘性。在梅堯臣的影響下，又開始模擬韓愈「以文爲詩」。《鞏縣初見黃河》、《代書寄尹十一兄、楊十六、王三》、《和聖俞〈聚蚊〉》等作品，嘗試將古文作法貫徹於詩歌創作之中，邁出探索宋詩新調最可貴的一步。

第二個時期，自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貶官夷陵到至和元年（一〇五四）除母喪

前，這是歐陽修詩歌創作的成熟期。景祐三年五月，主張朝政革新的范仲淹遭受貶謫，歐陽修激於義憤，撰寫著名的《與高司諫書》，亦被貶官夷陵。夷陵之貶在歐陽修的人生道路上意義非凡，它使詩人原先汴京及洛陽式的文士生活發生根本變化，也使詩人在文學創作道路上邁出重要步伐，有道是「廬陵事業起夷陵，眼界原從閱歷增」（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一錄莊有恭詩）。突如其來的政治打擊，使詩人開始體味到宦海風險，而遣發到偏遠閉塞的夷陵小縣，更讓詩人感知孤獨與寂寥。「今日始知予罪大，夷陵此去更三千」（《琵琶亭》），「平日兩京人少壯，今年三峽歲崢嶸」（《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》），可見其心境之悲涼。然而，身處逆境的歐陽修，並不以遷謫為懷，公事之餘暇，他與同僚丁寶臣、朱處仁等游賞夷陵山水，詩文酬唱，自得其樂。《黃溪夜泊》、《三游洞》、《黃牛峽祠》、《和丁寶臣〈游甘泉寺〉》等詩作，進一步嘗試以古文作法入詩，詩中融入理性思考，繼續探索宋詩新調。景祐四年的《戲答元珍》，標題雖然冠以「戲」字，卻絕非游戲筆墨，詩人感慨政治流落與客子悲哀，同時體察山城早春的生機與活力，末聯自慰自勉，於低回中見激昂，展示詩人的通脫曠達。全詩有牢騷而不頹唐，表痛苦而顯達觀，是詩人政治上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後的心理寫照，彰顯一代宋詩的基本思想風貌，昭示歐詩創作開始走向成熟。

慶曆新政前後，隨著歐陽修散文創作的成熟，其詩歌題材不斷拓展，表現手法日臻完善，個人風格逐步形成，並漸次成爲文壇新領袖。新政失敗後，歐陽修再貶滁州，受新政思潮的影響，他開始專力將革新精神貫徹於文學創作，詩歌作品擺脫模擬唐音，開始對前人多種詩體的綜合傳承。《答楊闢〈喜雨〉長句》、《水谷夜行寄子美、聖俞》、《讀〈蟠桃詩〉寄子美》、《菱溪大石》、《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》等作品，標誌以文爲詩、以議論爲詩、以才學爲詩等宋詩特質日益明顯。與此同時，歐陽修回應韓愈「不平則鳴」的史學理念，繼承「發憤怨刺」的史學傳統，一種斷絕已久的高蹈古硬、豪爽慷慨的詩風開始復蘇，一種從唐人詩歌當中脫胎而出的新詩新氣象逐漸成熟。

詩人貶官滁州至重返京師的十年輾轉，是歐詩平易疏暢風格的形成期。慶曆新政的失敗，滁州貶官以及「張甥案」的人格侮辱，使詩人心態又一次蛻變。世事無常、仕途兇險的人生體驗，時空無涯、人生有限的生命認知，加劇其對社會人生的理性思考。此時的歐陽修，不再是前期力主激進改革、遇事極力抗爭的角色，而是在歷經坎坷，飽受風霜之後，漸趨理性和現實，開始學會把外在世界的觀照與內在情緒的排遣有機融釋，將欣賞山水的樂趣和與民同樂的情懷相互糅合，從而變得更趨理智、寬容、平和與灑脫。詩人的平常心態，促成其平易詩風的自覺追求。滁州美麗的自然景觀、豐富的人文勝跡，一一融入

其平易流暢的詩筆。如《游瑯琊山》、《瑯琊山六題》、《題滁州醉翁亭》、《會峰亭》、《幽谷晚飲》、《幽谷泉》、《豐樂亭游春三首》、《別滁》等作品，詩人以輕鬆、閒適的筆調，摹寫質樸優美的風景，表達灑脫恬靜的心境，展現詩人在逆境中超脫世俗，追求高遠的思想境界，寄寓詩人以順處逆、明哲保身的幽雅情懷。當然，此時的詩人並非完全流連光景，醉心山水，朝廷的奸佞當權，政壇的深重流弊，總讓詩人難以平靜，因而也有一些鄙視醜惡，抒寫憤懣情感的詩作，然而即便是此類題材，也是見疏暢而不見怪僻。慶曆六年的《讀〈徂徠集〉》、《憎蚊》，慶曆七年的《重讀〈徂徠集〉》、《滄浪亭》等，就是此類代表作。這是詩人行藏用捨思想的並存期，也是其平易詩風的成型期。其間太白體、韓孟體、長吉體紛紛融入歐詩，而最終消融於平易流暢的詩風之中。在理性的文化觀照中，歐陽修也開始關注日常生活，歌詠平凡事物。素來不為前代詩人注意的橋、硯、蟲、魚、鷺鷥、紫屏、假山、橄欖、茶葉等，全都悄然引入詩題。如《啼鳥》、《憎蚊》、《菱溪大石》、《桐花》、《寶劍》、《拒霜花》、《畫眉鳥》、《野鵲》、《詠雪》、《寄生槐》等詠物詩，詩人在平凡事物之中灌注文人雅士的志趣品味，使之具有文化意蘊，並漸次成為宋詩區別唐詩的鮮明特色之一。

第三個時期，自至和元年（一〇五四）返汴京任職至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離開京

師，這是歐陽修詩歌創作的鼎盛期。詩人此時身居要職，地位顯赫，政治上雖然未能大有作為，文學創作卻是登峰造極。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，歐陽修知貢舉，痛抑怪誕僻澀的太學體，古文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，文壇盟主地位趨於穩定。此時的歐詩「以文爲詩」已達隨心所欲的地步，詠物叙事詩歌進一步增多，詩歌的記述功能進一步強化，如《葛氏鼎》、《書素屏》、《馬鬣雪》、《風吹沙》、《白兔》、《初食車螯》、《盤車圖》、《小桃》、《雙井茶》、《鬼車》等。嘉祐年間，作爲東京汴梁詩人群體的公認領袖，歐陽修組織的各類文酒詩會，各種以指定物爲歌詠對象的連環酬唱，如《白兔》、《吳學士石屏歌》、《梅聖俞寄銀杏》、《和劉原父〈澄心紙〉》、《嘗新茶呈聖俞》、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等，對於宋詩向「學人化」方向演化，對於以文爲詩、以議論爲詩、以才學爲詩的宋調形成，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嘉祐年間歐陽修的文壇活動，包括科舉取士、文學創作、經學研究、史學著述、金石考古等，對於北宋後期詩壇人才的貯備，宋詩深廣文化意蘊特質的開拓，以及整體宋詩精神氣質的奠定，乃至整體宋型文化基本內涵的建設，其創領功能與主導作用可謂舉世公認。

第四個時期，自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出知亳州至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去世前，這是歐陽修詩歌創作的結束期。歷經治平四年「長媳案」誣謗，詩人對政治愈發不抱希

望，加之身體每況愈下，以及無功而受厚祿的自疚，更加堅定詩人隱退江湖、歸養天年的決心。隨著詩人的淡出政壇，詩歌創作的社會政治意識也逐漸淡化，轉而追求自適，歸心天然。這時的歐詩，大量採用近體，審美趨向追求自然天性和個人情趣。「誰爲寄聲清穎客，此生終不負漁竿」（《攝事齋宮偶書》），「青衫仕至千鍾祿，白首歸乘一鹿車」（《書懷》），「終當自駕柴車去，獨結茅廬潁水西」（《下直》），「誰言潁水似瀟湘，一笑相逢樂未央」（《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》），這些詩句表達的嚮往歸隱，追求閒適的生活願望，抒寫的解官歸田、頤養天年的生活情趣，成爲此時歐詩的主旨與基調。此外，《歲晚書事》、《歲暮書事》、《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》、《春晴書事》、《青州書事》等抒懷作，《新春有感寄常夷甫》、《贈許道人》、《答和王宣徽》、《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》、《答樞密吳給事見寄》、《贈潘道士》等友輩寄贈作，以及《游石子澗》、《憶焦陂》、《游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》、《初夏西湖》等寫景記游作，無不流露歸隱之思與閒適之志。晚年的歐陽修，還吟誦大量的思穎詩作，並把自己先後創作的十三首《思穎詩》、十七首《續思穎詩》勒石紀念，寄託自己深切的田園歸隱夙願。

清蔣士銓《辯詩》指出：「宋人生唐後，開闢真難爲。」它簡明而深刻地揭示宋詩創作成就來之不易。在唐詩藝術登峰造極之後，宋人要想造就屬於自己時代的詩歌，務必

通變創新，探索一條新路子，開闢一片新天地。在宋代詩歌由群體精神高揚向個體自覺催化的演變進程中，歐陽修先後作為西京洛邑文人集團的骨幹、東京汴梁詩人群體的領袖，在宋調探索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開山之功，這種歷史功勳首先表現在詩歌理論的建樹和文壇領袖的導引功能。宋詩復古作為北宋文學復古的組成部分，依倚儒學復興的文化背景，其整體發展過程與北宋古文革新相始末。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卷二在肯定梅堯臣為宋詩「開山祖師」的同時，指出「歐公詩如昌黎，不當以詩論」。其實質在於揭示歐陽修並非一個單純詩人，而是一位文壇宗師，他的文壇領袖地位和一切學術文化活動，包括經學、史學、文學，也包括文學當中的文學理論、詩歌、散文、詞、賦及筆記小品等，影響整個文壇。在這種深層文化背景下，歐陽修的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深刻地影響時人，無論是題材內容的開拓，還是藝術表現手法的創新，都導引並決定著宋調的最終形成。

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傳世的九百三十七首詩歌，從內容與表現手法上，大致分為抒情、議理、詠物寫景三大類。

一、抒情詩。抒情詩約占歐陽修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，其中有些抒情詩直接抒寫政治情懷，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。詩人不滿西崑體詩歌的內容缺失與感情貧乏，主張繼承《詩經》的現實主義傳統，以充實的內容和真摯的情感反映社會生活。其《書梅聖

俞稿後》倡導詩歌「英華雅正」，又明確闡釋詩歌創作目的，主張「吐策獻天子」（《送朱職方表臣提舉運鹽》），「爲我持之告採詩」（《答朱案〈捕蝗詩〉》）。《食糟民》一詩，作者抨擊與民爭利的朝廷「權沽」政策，譴責對農民百端取利的地方官員，表達對平民百姓苦難生活的同情與關切，展示一位封建循吏的正直良知與社會責任感。其出使契丹途經雄州的感懷之作《邊戶》，則以自叙的口吻，高度讚揚邊民的尚武殺敵精神，揭露「澶淵之盟」導致邊民的不幸遭遇，抒發一位愛國詩人對朝政時局的憂慮與憤激之情，婉刺宋廷屈辱外交、苟且偷安的腐敗政治。他的《贈杜默》還提出詩歌「通下情」說：「子盍引其吭，發聲通下情。上聞天子聰，次使宰相聽。何必九苞禽，始能瑞堯庭。」主張用詩歌反映社會不公和民生疾苦。這些積極的詩歌創作理念，決定歐詩強烈的現實主義特點。

歐陽修有些抒懷詩，反對啼飢號寒與自鳴悲戚，展示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、隨遇而安的曠達情懷，彰顯宋代文士的人格力量與道德風貌。詩人一生飽經風霜，備受劫難，貶官夷陵途中寫的《與尹師魯書》說：「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，此皆不知修心也。」當身處困厄窘境時，他拒絕不理解者的廉價同情，不僅風節自礪，而且告誡朋友「慎勿作戚戚之文」。他批評一切身居逆境，不耐貧寒，傾訴牢騷哀怨的人，就連自己最敬

重的韓愈也不放過，指責其「到貶所，則戚戚怨嗟，有不堪之窮愁，形於文字，其心歡戚，無異庸人」。歐陽修的貶謫詩多表現曠達胸襟，不以個人悲喜爲懷。《黃溪夜泊》在描繪三峽夜景之後，詠道「行見江山且吟詠，不因遷謫豈能來」，詩人身處貶所，卻慶幸因此得以吟詠夷陵秀美山川，這是何等的豁達和超脫！清人陸次雲《宋詩善鳴集》卷上評論此詩說：「以見江山爲慰，遷謫人善自遣心之法。」又如作於夷陵的《戲答元珍》，作者抒寫謫居窮鄉僻壤的落寞情懷，寄託政治上遭受打擊後的人生感慨，雖有病人新年、聞雁思鄉的傷感情緒，尾聯卻一轉折：「曾是洛陽花下客，野芳雖晚不須嗟。」表明身處困境的詩人依然樂觀自信，滿懷向上的希望。詩人盡力淡化人生道塗的種種悲哀，並將其濾化成平易而灑脫的詩意，誠如錢鍾書《宋詩選注》所云：歐氏「閒適細膩，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，熨帖出當前景物曲折細膩的情狀」，體現宋人典型的靜謐內斂之美。然而，即便是本人情、狀風物、吟詠閒情的詩作，其「閒適」背後仍蘊含一種「崢嶸」之氣。詩人這種高曠的人生觀、疏放的詩風，濡染當時作家，沾溉時代詩壇，最終形成宋詩思想內涵的一大特色。

二、議理詩。歐詩議論的內容極其豐富，涵蓋時政、學術與物理等諸多方面。一些議論時事、評述朝政的詩作，有似奏疏與政論，具有濟世救民的功效。天聖九年（一〇三

一）《答楊闢〈喜雨〉長句》云：「今者吏愚不善政，民亦游惰離於農，軍國賦斂急星火，兼併奉養過王公，終年之耕幸一熟，聚而耗者多於蜂。」詩歌分析北宋王朝國困民貧的原因，宣傳農爲國本、節用愛民、改革吏治等政治主張。後來，作者康定元年（一〇四〇）撰寫《原弊》，闡述同一思想內容，本詩的每一句，幾乎都可以從此文中找到如合符契的注脚。又如《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》，有云：「天下久無事，人情貴因循。優游以爲高，寬縱以爲仁。今日廢其小，皆謂不足論。明日壞其大，又云力難振。旁窺各陰拱，當職自逡巡。歲月侵隳頹，紀綱遂紛紜。」詩人痛切地感慨慶曆新政失敗後，朝政回歸因循苟且的老路，政弊纍纍。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，不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所能奏效，必須全面改革，首先要澄清吏治，任賢去不肖，而且行爲務必果斷，切忌猶豫遲疑。這些精闢而深刻的觀點，詩人在慶曆新政前後的有關政論文中，都曾反復闡述過。

有的議理詩，表現對儒家學理的思辨。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《顏跖》詩云：「顏回飲瓢水，陋巷卧曲肱。盜跖厭人肝，九州恣橫行。回仁而短命，跖壽死免兵。愚夫仰天呼，禍福豈足憑？」詩人針對文獻記載的顏回安貧樂道卻短命壽夭，盜跖橫行肆虐而終享天年，質疑傳統的「善惡報應說」。既而自作辯解：盜跖長壽，卻留下千秋罵名；顏子短壽，卻英名光照千古。最終得出結論：「生死得失間，較量誰重輕。善惡理如此，毋尤天